



「天主教於香港的角色有兩個，一個是僕人的角色；一個是先知的角色。僕人的角色即愛德的服務，傳統都是這樣。現在亦強調先知的角色，愛德服務只解決即時性、個人性的需要。你供給他人吃食，但這些年來有許多人不能果腹，原來是問題源自政府的制度。所以我們要發聲，成為先知，作無聲者的聲音。」

夏志誠輔理主教

大眾對天主教會的印象都是熱心公益但風氣保守的宗教團體。但現任教宗方濟各的作風貼近民眾，香港的陳日君樞機更親身參與社會事務，一反過往對天主教聖職人員的印象。這一次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專誠訪問了現任香港天主教教區輔理主教夏志誠，讓大眾可以透過夏輔理主教，了解天主教教區在當代香港社會的真正面貌、角色及其社會價值。

信仰經歷

夏志誠輔理主教認為自己歸信天主教原因是人生的際遇，也算是有天父的帶領。他並非生於天主教家庭，但就讀基督教小學的時候，已開始對基督宗教產生興趣，更萌生了領洗的念頭。不過當時的他很年幼，實際上沒有去領洗。小學畢業後，他在天主教中學研習道理。「後來我在天主教裡領洗，接觸教內活動及團體，開始覺得教會的領袖，即是神父挺吸引。他們閱歷很多，能說道理，吸引很多青少年的心。自己有點仰慕他們，想成為做神父。」主教指自己預科後無法升讀大學，於銀行工作，很實際地繼續生活和賺錢。「滿足於現況，自然忘記全職事奉的想法。」

令夏輔理主教成為神父的契機是他去朝聖的經歷。

「當時我去了聖母瑪利亞顯現的地方，是天主教比較獨特的聖地。其實去哪裡不重要，最要緊是抽離，離開香港，離開工作，全時間投入宗教的事情，休息一下。令我覺得很舒服、很好。」經過沈澱與抽離，返港後他覺得自己有不足之處，喚醒中學時成為神父的心志，所以重新投入信仰，找修會，開始成為神父。



夏主教與本中心主任李樹甘博士（中）及客席成員林皓賢先生分享其信仰經歷。（鄧諾霖攝）

教區社會服務

夏輔理主教認為香港天主教事務主要由三個部份組成，分別是社會服務、堂區和學校。社會服務主要是明愛負責，其規模相當大，有員工五千多人。但由於明愛要向政府申請一次過撥款，所以其精神宗旨是教會，裡面的制度運作則要向政府負責，因此較為獨立。堂區是天主教行政區劃分單位，跟據輔理主教所述，現時香港劃分了五十一個堂區，堂區又分為八個總鐸區，總鐸區再上一級就是天主教區中心，由教區進行分層管理。堂區直接由本堂神父管理及調動人手財政。相比明愛，堂區的活動較能表達教會精神，但相對沒系統性。香港天主教會背景的學校有二百七十間。除了明愛十多間學校，約一半的天主教學校都是由修會所設立，如傳統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及華仁書院。明愛的學校相對來說不太著名，主要服務些基層及有需要的人士，例如馬登基金中學。夏輔理

主教慨嘆：「這些服務不容易，學生需要花很多心力去教導。」他指出無論是教區、修會或明愛的學校，都是在教育局的督導下從事教育，並非直接傳播天主教。關於未來的計劃，他希望籌辦有天主教精神的大學，「但實際能主導多少是未知之數，因為在香港辦專上學院需要政府資助，但你取了她的錢就要聽他的話。」

在 21 世紀，天主教的服務會否有新突破？輔理主教回答教區的服務是因應時代發展，例如，「（由於）教廷的要求，我們於七十年代已經有正義和平委員會。另外在 2000 年前後我們都發展了勞工事務委員會，於港九新界三個地區成立三個中心，照顧比較草根、基層的人士。」他認為基層市民需要我們去關懷，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權益。「我也曾探望基層市民，認識一下他們。那些保安員他們一天很長時間上班，沒有時間去聽收音機看報紙。他們不知現在勞工法例改變了，有時甚至不知最低工資增長了。」另外也要與弱勢社群一起爭取權利，「南亞裔去勞工處找工作需要靠社工的幫助，但原來勞工處有翻譯，當然被放在最隱蔽的地方，好像不想你們來找他。因為政府本來有此服務，但他們又不想太多人找翻譯，所以會說沒有空接待我們，而且請翻譯是很昂貴的。我們覺得他們做得不對，所以對勞工處說他們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如果再不這樣做我們會投訴。有些情況，他們就會做。」

歷史久遠的教會制度

問到聖職人員的架構組織，主教認為對非信眾來說比較複雜，因為歷史很久遠，教會制度很特別，會分到很仔細：「在聖職上其實只有三個崗位而已，就是執事、神父與主教。」執事可於祭壇工作，但不可做彌撒。神父則可講道、做彌撒及聽告解，但不可擢升他人為神父。主教就沒限制。湯漢樞機是香港天主教區的正權主教，英文是 Ordinary，即正常那個，因為教會傳統中一個教區只可有一個主教。但現時有五個主教，一位退了休，一個正權主教，三位輔理主教。設輔理主教原因是香港教區有事務越趨繁忙，教廷覺得需要增派人手，但沒有規定數量。胡振中擔任的正權主教時候有兩位輔理主教，現在則有三位。樞機聖職上與主教相同，是教宗的智囊團，他們可被選為教宗，亦可選教宗。輔理主教中有職級叫助理主教，他們有正權主教的當然繼承權，不用教廷再委任。輔理主教職位又可分為副主教，夏輔理主教指副主教此職級應翻譯為主教助理，即一般事務的代理。副主教不需要是主教，可以是個神父。」

在處理實務時，天主教傳統增加了不少工作及有實行上的困難，但對天主教來說有其重要的意義。輔理主教舉出例子：「每個教區都只可有一個主教的傳統是從初期教會的教父及早期的神學家經反省後而設立的，具神學觀，反映教會的一體性，所有神父、聖職人員圍繞一個主教，道出教會的團結、合一。雖然較為繁瑣，但存在解決方法，如給主教名義上的教區。天主教很強調信仰的繼承，所以我們一般不希望有太多的改變，但不排除有些情況會是過時了。」

至於甚麼情況天主教會覺得需要改革？夏輔理主教認為需要看聖神的引導，也與教宗本人性格也有關。例如本篤十六世為人較謹慎；方濟各較牧民性。「如果要有重大革新，我們會召開大公會議，五十年前曾經召開過，名叫梵蒂岡第

二屆大公會議，由 1962 年至 1965 年。全世界主教都會參與，這些會議談及整個教會的改變。」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較大的轉變是提高地方的主教權力，中央的權降低。「到現任教宗方濟各，他曾提出過再進一步放權，但未完全做到。實際上主教任命，是教宗執行。財政方面，地方基本上要獨立。其他如禮儀的方式，規定了大框架，可以作出本地化的微調，只要不違返教義就可以了。」夏輔理主教舉出幾個例子：「可否於彌撒跳舞？香港人不愛跳舞所以不可行，但非洲人在彌撒就必會跳舞。若香港的青年人又喜歡跳自己的舞步，又行不行呢？」輔理主教繼續解釋：「彌撒我們最重要的聖體聖血，必需是葡萄酒及未經發酵的麵餅。但中國人說：我們不吃麵餅而吃飯，不用葡萄酒而用米酒，這就不行了。」

社會訓導

天主教普世教會有獨有的社會訓導(social teaching)，使他對政治及社會事件有較深的理解，發生問題時可根據社會訓導，找到有關選舉、權利等定義。輔理主教以選舉委員會作例子：「選舉委員會目前給予天主教六席。如果教友想進入選舉委員會，我們只會證明你是天主教教友，但並不代表天主教。如果有意參加人數太多則抽籤決定。因為社會訓導說，我們應關心政治。但我們覺得目前選舉特首的機制有嚴重的不足，所以就用最低限度參與。」

第一份社會訓導於 1891 年發佈，針對自因工業革命而冒起的共產思想。共產主義受歡迎原因在於民眾真的處於受苦，被剝削的狀態，所以教會認為需要作出反思。於是隨著世界的演變，教廷會因應時勢發佈文件，組成了社會訓導，另外有很多神學家作出反省，因而產生一大批相關論述。據輔理主教所述：「二次大戰後或冷戰後、80 年代柏林圍牆等大事也會有反省。最近那次是方濟各於 2015 年 6 月的『願祢受讚頌』，它是由氣候變化出發，點出了社會的不公道，批評北半球一直發展是取了南半球的資源，指出人類應該怎樣與社區甚至環境去相處。」



和富基金及浸會大學聯辦的五大宗教論壇，夏主教分享了天主教對於自由價值的看法。（林皓賢攝）

夏輔理主教坦言於和富宗教論壇中談及對自由價值的看法時，全都引用了教宗「福音的喜樂」部分的資料，故他的看法基本上與教廷一致。但在應用社會訓導方面，他同意主教有輕微的詮釋權：「雖然資料已經寫出來，但怎樣解釋也是可以的。有些主教可能覺得教宗是說得對，但在某情況下就不是這樣應用。他們可能會這樣說，做一點改變。」

他補充，「始終社會訓導說的是大原則，對象是全世界，不可能說得太仔細，不可能提到佔中。」

香港天主教教區與其他宗教

夏輔理主教指出天主教以往對其他宗教比較疏離。但經過 60 年代的大公會議後，態度上有很多轉變。現在對其他宗教有兩個層次：一，與基督宗派的合一運動；二，與其他宗教的宗教交談。

「與基督宗派較容易合作，因為大家始終都是同一源頭。11 月我們會舉辦栽培教友的合一課程，請了基督教的牧師來。另外也與幾間神學院交流，崇基、信義與我們一起交流。在教區層面中有兩個委員會，基督徒合一委員會及宗教交談委員會，會定期去基督教協進會觀察及列席，認識他們。每年也有基督徒合一祈禱週，舉辦些活動如合一拜苦路、青年合一避靜、互相交換講壇。近年亦多了與正教合作。」

天主教與孔教、佛教、道教合作的活動則不多，保持在友誼上的交流，參加「六宗教領袖座談會」及「和富宗教論壇」，亦有禮節性拜訪。輔理主教指出實際上的合作出現要等待時機，「今年中秋節翌日將會有由不同宗派的平信徒一同舉辦的活動，主力為天主教徒。當天會於大嶼山邀請各宗派領袖一同祈禱，走一段路。為生態、為大家共同關注的議題合作，是個剛起步的計劃。」

天主教與極端主義

社會上因極端主義興起而爆發的衝突愈演愈烈，但夏輔理主教認為在普世天主教中，情況不算嚴重。他解釋：「這與整個天主教制度有關，因為我們有教宗，有中央。我們一直的教導是要跟隨教會的傳承，在這種教導下的教友有疑問時就會詢問權威。甚至在羅馬，有部門在道理上爭論不斷時會開會解決問題。因此在制度上能化解衝突，教導上也相對不易產生異端。」他憶述有些很保守的信徒想回復上世紀的禮儀方式。教會也歸納了他們的意見，容許他們使用部份以往的禮儀，但要求他們保留一些現今的禮儀，取得平衡後就沒有再出現狀況。

但他承認從制度上防範極端主義的產生有其壞處：「教友活力較低，比較被動。他們覺得天主教教徒有十多億，不去教會、少點奉獻也不會有影響。」那天主教會否嘗試提高教友的主動性？夏輔理主教回答：「當然希望吧！又要合一，信仰不要走偏，但又希望有活力。教會又是制度又是神恩，但在人的限制下很多時候出現矛盾。我們傾向保障信仰的統一，教會活力就會低點。」

天主教在香港的價值

當宗教與社會互動時，難免會彼此影響。夏輔理主教覺得很難界定兩者那個影響力較大，「因為看見很多信仰群體都在爭扎之中，但同時看見可喜的跡象，很多教友醒覺，認為要堅持信仰原則。」輔理主教補充：「越來越多教會人士願意接受認真、有系統的栽培。希望有多點這些人能夠較容易堅守，甚至影響

一下，但目前還需努力。」

如果要用話總括天主教在香港的角色，他認為天主教兼有是僕人和先知的角色。僕人的角色即傳統上愛德的服務，現在亦強調先知的角色。「愛德服務只解決即時性、個人性的需要。你供給他人吃食，但這些年來有許多人不能果腹，原來是問題源自政府的制度。所以我們要發聲，成為先知，作無聲者的聲音。」

輔理主教強調天主教並非要掌控社會：「始終我們是教會，是個宗教團體，宗教團體最後都會回歸到信仰，傳播這個信仰。」他相信教區所做的事務目的在於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因為覺得天主教好，所以傳播其精神，去告訴別人，至於是否接受則是他人的事。現在，未來也是如此。

小結

透過夏輔理主教的訪問，筆者感受到天主教教會很多元化地參與社會，除了社會服務和教育，在政治方面透過社會訓導的形式教導信眾，亦不斷告訴大眾天主教於社會的價值及角色，令所有事情都很落地，甚至追上潮流。在夏輔理主教及教廷的努力下，相信愈來愈多人會有機會重新認識這個西方宗教。



(文：鄧諾霖 校：林皓賢)